

绝密档案

苏杭 苏若群 姜羿〇著

下



第一次国共合作内幕

以后要加紧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里面取得的。
——毛泽东

俄罗斯最新秘档揭示

秘密协议与越马提纲中的利益旋涡

东征与北伐中密布的反共阴云

莫斯科领导者眼中的蒋汪互斗

人民日报出版社

绝密档案

下

苏杭 苏若群 姜羿◎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下 卷

一 决策北伐的是是非非

· 陈独秀失踪后的特别会议

1925年12月26日，按习惯应该来中央机关看文件的陈独秀没有来。27日，他还是没来……一连好多天，陈独秀都未曾露面。秘书处的任作民首先恐慌起来，他将情况报告了瞿秋白、张国焘和彭述之。

瞿秋白等人得知陈独秀失踪，也大为惊慌，急忙派人去找。但由于陈独秀的住处一向对外人保密，谁也不知道他住在何处。当时中共还处于秘密状态，又不能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偌大一个上海，要找陈独秀，无异大海捞针。

时间一天天过去，陈独秀仍然音信全无，大家几乎绝望了。陈独秀究竟怎么样了？人们的普遍猜想是：他被秘密处死了！于是，张国焘带着哭腔对机关里的人说：“老头子（指陈独秀）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么个下场。”

就在陈独秀失踪以后，上海的各种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对中共中央机关进行搜查，使机关的人们更是心里惶惶。

上海的事很快被莫斯科得知。莫斯科方面认为，上海的政治环境恶劣，尤其是五卅运动之后，共产党成为反动势力的眼中钉，在上海的活动必然受到更大的限制。为了不再发生陈独秀这样的“悲剧”，莫斯科决定中共中央移往北京。

中共中央在失去了首领的情况下，只得听从莫斯科的安排。从1926年2月起，有关人员开始北上。

当时，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正联合进攻冯玉祥国民军，

北方的政局发生了逆转。于是，中共中央到北京的首要任务就是召开特别会议，制定相对对策。

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七人，共青团代表一人，北京区代表二人，广东区代表二人。正在北京的鲍罗廷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开始后，忽然接到陈独秀上海来电。原来，他得了伤寒病，住进了医院。电报中说，他现在已能扶病视事了。与会人员这才大大松了一口气。

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分析了五卅后的政治军事形势，作出了支持北伐的决定。会议指出：

现在的时局，实在是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反攻，然而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才能使全国人民得着必需的保证……本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亦就是加紧的在农民之中工作，尤其是在北伐的过程中，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①

会议还对中央机关地址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央已不适宜在上海，因为上海不是政治的中心，更不是目前革命的重心。中央地址只能在北京或者广州。而由于广州地处一隅，在指导全国工作方面较为不便，所以北京最为合适。如果国民军能守住北方现有的局面，中央就在北京；万一国民军失败，中央就移往广州。但由于中共中央的首脑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所以会议提出，这个问题必须在征得陈独秀同意后才能确定。

陈独秀虽因病未能参加北京会议，但他对会议的精神是完全支持的。

3月14日，在陈独秀主持下，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专门对北京特别会议的决议作出解释，并且更加明确了党对北伐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6—57页。

绝密档案

第一次国共合作内幕

的态度，通告指出：

“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重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广东政府是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只有他的势力之发展，可以推动全国民众及接近民众的武力更加爆发革命的火焰，而且广东政府也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煽动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暴动，才能增强自己的声威，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对势力所包围而陷落。”

同月，布勃诺夫使团到达上海与陈独秀会晤时，陈独秀又表示国民革命军应该立即出师北伐，以消灭吴佩孚。^①

此后，陈独秀曾四次写信给蒋介石和汪精卫，主张国民政府及早出兵北伐，以便趁吴佩孚势力尚未稳固时，加以打击，否则他将南伐，广东便没有积聚实力的可能。可见，陈独秀对北伐的态度并不消极，而是积极地督促、热情地支持。

对于中央地址问题，陈独秀认为，中央设在何地，应视何地能更便利地执行党在最近将来之重要使命，能顾及党的全部工作，能建立党的中央完密强固的组织而定。如果北方国民军地位稳定，则中央移往北京，在上海设交通处，广州设临时委员会；如果北京政局反动，是否移广州再行讨论。实际上，陈独秀有了中共三大前后在广州的那段经历，是不太愿意将中央移往广州的。

· 莫斯科不希望北伐

1926年3月14日，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决议，明确共产党对北伐的态度。此后，陈独秀四次写信给蒋介石和汪精卫，主张国民政府及早出兵北伐，以便趁吴佩孚势力尚未稳固时，加以打击。

1926年春，中国的形势却确实让莫斯科领导人捏着一把汗。在北方，国民军在直奉联军的进攻下，一败再败，冯玉祥被迫下野。在南方，国民

^① 参见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31年版，第379页。

一 决策北伐的是是非非

党二大上左派所取得的胜利局面在一夜之间被蒋介石发动的中山舰事件破坏。原来对中国革命形势寄予很大希望的斯大林等人，此时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政策。

斯大林等人从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和他的进一步夺权行动中，已经清楚地看到：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不是偶然的上层阴谋，也不是个别错误和某些派别、人物的没有分寸所致，而是广东内部，主要是农民问题产生的社会冲突的急剧尖锐化在政治上的反映。这个事件的后果则是国民党的政府权力和国民党的整个领导权从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和共产党人集团手里转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中派集团手里。在这种情况下，举行北伐是有害的。这是因为，通过北伐既可以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集团夺权的行为合法化，又可以使它的势力在国民党内得到巩固和加强，这对于广大工农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民革命是有害的。

基于上述认识，同时又担心北伐可能引起北方军阀张作霖与吴佩孚联合进攻南方国民革命军，还可能引起帝国主义联合武装干涉中国，因此莫斯科采取了反对北伐的政策。

4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

广州不应该提出占领广州以外新地区的目标，而应在现阶段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工作上。^①

驻华大使加拉罕收到此决定后，于4月3日紧急致电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提出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必要性，电文是：

答复您102号电。广州不应提出占领新地区的目标，但它可能迫于形势不得不进行这种扩张。现在在湖南，唐生智将军赶走了赵恒惕成了省督办。这是根据同广州的协议进行的，几个月前广州同这位将军达成了协议。现在的情况是：广州应帮助唐生智在湖南站住脚。唐生智是普通的中国将领，他同情广州，与其说是出于对它的原则的尊

^① 《丛书》3，第191页。

绝密档案

第一次国共合作内幕

重，不如说是出于对它的实力的尊重。如果不支持他，他可能屈从于吴佩孚。对他的支持可以是向湖南调动几个广州师，不动一枪一炮进驻那里，目的在于巩固唐的地位。实际上，这是和平占领该省。对湖南的这种支持也会巩固已对吴佩孚宣战的江西方本仁的地位。如果在湖南驻有广州军队，方会感到自己更坚强。方本仁在寻求同广州的联盟。他的代表(他儿子)今天来到我这里，请求给予支持和帮助同广州建立友谊。

广州的上述扩张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给以协助，这是预防性措施，因此在湖南可能受到吴佩孚的影响。我认为，作出的决定不适用于我所提到的具体情况。^①

加拉罕的说明并没有使莫斯科改变态度。

4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采納斯大林的建议，以中央名义给加拉罕发电，严厉指出：

1. 中央最近关于不希望广州军队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而要把广州的力量集中在巩固内部政权以及军队工作上的指示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
2. 在加拉罕同志第242号电报^②中发现有绕开这个指示的企图，要向加拉罕同志指出，不允许有直接或间接违背中央指示的行为。
3. 一旦迫切需要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这种行动只有取得中央同意方可进行。^③

这个电报发出不久，莫斯科领导人就相继收到回到国内的苏联顾问季山嘉、罗加乔夫等关于中山舰事件的汇报。鉴于蒋介石坚决要进行北伐和湖南唐生智要求广东政府出兵援湘的情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5月6

① 《加拉罕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26年4月3日于北京，《丛书》3，第201—202页。

② 即加拉罕4月3日的电报。

③ 《丛书》3，第202—203页。

日做出下列决定：

(1) 中央过去认为、现在仍认为不能分散广州的军事力量。(2) 鉴于目前出现的情况，认为可以派遣一支规模不大的远征军去保卫通往广东的要道——湖南省，但不能让军队扩展到该省疆界之外。^①

5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收到了布勃诺夫使团关于中国情况的总报告后，对北伐的态度又强硬起来。当天决定：

责成广州同志保证实行政治局不止一次重申的坚决谴责在目前进行北伐或准备北伐的指示。^②

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精神，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致函中共中央说：

目前提出广州进攻的问题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宣传角度来说都是根本错误的。从政治角度来说，广州号召同北方作战会被解释为广州不愿意维护和保卫和平，而愿意打仗。从宣传角度来说，它会给工农群众留下很坏的印象，他们可能会认为共产党人是战争的预言者。

· 维经斯基奉命劝中共

尽管莫斯科三令五申，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支持北伐的态度并未改变。这一点，1926年6月再次来华，在中国上海组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在未到上海之前就觉察到了。他于6月11日在北京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写信说：

① 《丛书》3，第241页。

② 《丛书》3，第267页。

绝密档案

第一次国共合作内幕

关于北伐问题，尽管莫斯科作了各种指示，但在这里这仍然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我还不能确切地说，中央的情绪怎样，但这里的同志们坚定不移地主张进行北伐。看来必须就此问题同中央认真谈一谈。”

6月19日，以维经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在上海正式成立后，一项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贯彻莫斯科关于阻止北伐的决定。

6月21日，远东局作出如下决定：“认为在广州内部业已形成的形势下举行北伐是有害的。”

之后，维经斯基即就北伐问题与陈独秀等人进行了几次认真的交谈。对于远东局反对立即北伐的态度，中共中央表示难以接受。在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6月30日，陈独秀在远东局会议上提出，以他自己的名义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拍一电报，说明中共中央内部一致主张进行北伐，以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①

鉴于国共两党对北伐的态度，维经斯基等人在有关情况作了必要的调查。7月1日，维经斯基发电给莫斯科，着重指出：

管理权集中在蒋介石手中，停止采取有利于农民的措施，这都便于准备北伐。为建立1000万元的基金，增加了农民的捐税，提前一年征收了税款，全部款项集中在总司令手中，500万收入中有450万用于军事预算。还有广东的政治工作也都是由其余所有人以准备进行北伐的这场革命进攻战的名义进行的。我们在邻近省份的组织也都在等待广州军队的到来，要反对这种情绪将是极其困难的。广州在围绕北伐……提出自己的打算：右派希望蒋介石率领军队北上，部分左派和部分共产党人鉴于有必要对群众进行革命的动员，幻想把恢复原来局面的希望同战争联系起来。蒋介石则指望利用这场战争把反对派将领派到华北去和筹集资金。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会议第2号记录》，1926年6月30日于上海，《丛书》3，第317页。

.....
在中央内部隐隐约约有一种要退出国民党的情绪。在北伐问题上，中央的态度一度摇摆不定。最近几天，随着代表团从广州返回，中央委员总的情绪又主张进行北伐，认为这是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的唯一出路。

.....
考虑到对政治形势的总的评价，我们认为把我们的政策同北伐联系起来是极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顺便指出，孙传芳对广州持中立态度，但如果广州军队开进江西省，他会改变立场）。广州应当采取防御立场，集中精力于内部的巩固和同邻省的密切关系上，以便建立南方的联邦。

.....
工作的重点口号不是进行北伐，而应当是提高工农群众的经济福利，巩固革命政府的基地。^①

这封电报的基本精神还是不主张北伐。

为了说服陈独秀等人改变对北伐的态度，维经斯基与陈独秀等人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

• 陈独秀引火烧身

其实，陈独秀虽然支持北伐，但也担心蒋介石会利用北伐来造成他个人独裁的局面。所以，从一开始，在大张旗鼓地表示支持北伐的同时，中共中央就反复强调，北伐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为主干，而不是单纯的军事进攻。

在维经斯基等人劝说下，陈独秀更感到此时北伐对革命无益。于是，在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的前两天，7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他

^①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电报》，1926年7月1日于上海，《丛书》3，第320—322页。

绝密档案

第一次国共合作内幕

写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

陈独秀在文章里充分表达了自己的对北伐的态度，他明确提出：

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在此时北伐声中，我们若不懂得这个意义，便会发生许多错误的观念及行动。

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是各阶级革命的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自求解放：全民族经济解放，尤其是解除一般农工平民迫切的困苦。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方法，然亦仅仅是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在军阀统治之下的民众，若误认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人民之唯一无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工作，这便是大错。这便和前代人民仰望吊民伐罪的王师是一样，完全失了近代革命的意义。再论到北伐军之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了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

陈独秀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后，断言：

所谓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现在尚未成问题；因为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状况上，在整个的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所属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

陈独秀的文章一发展，立即在国共两党内引起了纷纷议论，拍手称好

者有之，顿足谴责者亦有之。

在国民党内，右派分子，甚至一些向来表现左倾的人，都对陈独秀文章中的观点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中共党内也有反对陈独秀观点的人，如瞿秋白指出：北伐战争是五卅运动之继续发展的中枢。中山舰事件后，民族资产阶级夺到了领袖权，可是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革命化是异常之迅速急剧，现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指导权，已经亟亟乎殆哉了！而且北方的反动政局不足以完全打消农民运动，正足以使农民革命运动日益迅速的发展。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所以，中国共产党不能反对北伐。

瞿秋白根据自己的观点写成《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送到《向导》编辑部，但编辑部的答复是：拒登！

当然，也有支持陈独秀观点的。张太雷公开发表文章，认为陈独秀的观点是对的，是对革命同志和国民政府的忠告。

• 责难与辩解

陈独秀没有想到，他的一篇论北伐的文章，竟然在国民党内引起了这么大的轰动。

国民党内对这篇文章口诛者有之，笔伐者更有人在。尤其是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张静江，在找过鲍罗廷之后，又于8月13日专门写信给陈独秀。信中说：

国民政府此次出师，为实现总理主张之第一步，今日国中，外而为帝国主义者之爪牙，内而逞其武力，使人民无法生存，国家无由建设者，无一非军阀为之首恶。故出师北伐，廓清军阀，虽非国民革命之全部工作，实为国民革命之惟一先著也。凡在革命旗帜之下，同抱打倒帝国主义目的者，对此惟一先著，应无异议，足下更何忍加以攻击乎？夫北伐军之性质程度及平日之训练，当为足下所素知，尊著乃对于北伐军出师，糊涂闪烁，加以投机权位之恶名。使民众而尽闻足下之言，且以足下之言为可信，其影响所及，足下曾一计之乎！至于

绝密档案

第一次国共合作内幕

因北伐而筹款，为此间不得已之办法，足下固认此次出为防御之战者，则寇盗在门，岂容偃息，塞井夷绳，尚非苛政。政府以不忍之人心，筹不得已之款。兢兢业业，未尝稍弛，足下如能来此一游，必知真相。乃据远道传闻，遽施攻击，且施攻击于北伐中与贼相持之时，实此间同志所惶惑不解者，切望足下之一注意于北伐前途合作意义者也。最后尊著中对于国民政府的政治实力及国民革命军革命，一概加以否认，且因此否认此次出师之为革命，尤近于臆断。此种臆断，出诸敌方，则为当然，出诸足下，实为意外！

以上所言，全出至诚，足下明达，当不悻悻。总之，北伐之失败，乃一切革命者之失败，一切革命者在此革命急迫期间中，能合作则存，不能合作则亡，相扶助则存，相猜忌则亡，此必然之理，必至之势也。足下领袖群彦，动关众听，惟望以后明辨事理，郑重立言，此间如确善处，不防函电相绳，资为药石。若翹此以为报章快心之谈，则甚非所望也。忠切之言，诸希亮察。^①

除张静江的信外，陈独秀还相继接到署名为“符琇”、“黄世”、“冥飞”等人的来信，信中均对他的文章提出异议。

符琇在信中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各阶级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求他们的民族政治经济独立的一种革命。况在这种革命过程中，免不了要消除军阀这种障碍，要消除这种障碍，非有一种军事行动不可（即孙总理所说的军政时期）。而先生为什么要说：‘……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然则中国的民族革命的国民革命的政府出师北伐，是代表少数人利益而奋斗的吗？先生说：‘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办法，然亦仅仅是一种重要办法，而不是唯一无二的办法。’请问先生唯一无二的方法是什么？先生说：‘再论到北伐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先生在大作起始不是说：‘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这层意思与那层意思，岂不是冲突了吗？然则

^① 《向导》第171期。

还是一个人的军事行动吗？先生说：‘近来国民政府对于农民态度已经使农民怀疑’，这怀疑之点，请先生告知我。”

黄世在信中也是一连串的反问：

“先生恐北伐，摇动革命根据地，而反对北伐吗？何以不在北伐军未动员以前反对，而现在才发表这篇论文？先生恐怕农工平民，因筹备军饷而怀疑国民政府，或甚至……而进忠告吗？我想这是国民政府乐于接受的；但就革命观点上，两党联合战线上，严重的北伐时期上看，先生何以不直接忠告，而偏偏要在北伐紧急，后方需要绝对的安宁时公开的忠告呢？先生想变北伐为防御战争，以巩固革命根据地吗？先生何以不直接与北伐当局者商量，而要公开肆口攻击国民政府的政治状况上，实力上……如何的不配北伐，他的领袖们如何如何，对人民又如何如何呢？所以我始终想不到先生这篇文章的用意？”

“冥飞”则在信中写道：他的一位国民党员的朋友说，陈独秀的文章具有挑拨性质，是来分散革命势力的。其理由是：

“一、国民政府北伐，纯粹是要达到“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目的。完成国民革命，在此一举！而独秀仅说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这是太小看了北伐的意义，而且蔑视我们国民党！”

“二、独秀说国民政府因北伐战费而预征钱粮，抽收赌捐，向农工平民搜刮，连唐生智也不如；这是等于向北洋军阀告国民党监视下的国民政府的密，与陈炯明之反革命没有什么差异。

“三、从这篇文章里，看出共产党的领袖——独秀——好像认定蒋介石为一个变相的军阀，国民党的革命指导者，不过是些饭桶！”

“国民党是代表全民的，不能单独代表那一阶级的利益。广东农民困苦，负担太重，这是革命过程中，不能避免事实，若北伐成功，自然可以减轻他们的赋税。现在独秀如此的渺视北伐，简直不愿意民众得到解放，尚谈什么革命！”

“共产党是倚赖国民党才得发展的，独秀不满意国民党，实是自杀政策。”

对于这几封信，陈独秀没有弃之一旁，也没有封存起来，而是将它们全部刊登在《向导》第171期“读者之声”栏目里，并且在同一栏目内，以张

绝密档案

第一次国共合作内幕

静江的信为主要对象，亲自作了答复。

陈独秀在复信中不急不躁，于侃侃而谈之间驳斥了对方的观点，坚守了自己的立场。他写道：

你们说：“出师北伐，廓清军阀，虽非国民革命之全部工作，实为国民革命之惟一先著也。凡在革命旗帜之下，同抱打倒帝国主义目的者，对此惟一先著，应无异议，足下更何忍加以攻击乎。”我前文曾说过：“北伐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在此等军事行动之先，应该以充分的民众宣传与组织为先著，现在你们仍旧以出师北伐为国民革命之唯一先著，你们这种军事行动万能的老观点仍然丝毫未改，怎不令人失望！军阀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抱打倒帝国主义目的者，当然主张要打倒军阀；但我们对于出师北伐是否国民革命之唯一先著，对于怎样出师北伐，和你们都有不同的意见，你们一闻不同的意见便以为是攻击，你们这不受善言的老脾气也仍然丝毫未改，更是令人失望。

你们说：“北伐军之性质程度及平日之训练，当为足下所素知，尊著乃对于北伐军出师，糊涂闪烁，加以投机权位之恶名。使民众而尽闻足下之言，且以足下之言为可信，其影响所及，足下曾一计之乎？”你们当知：现在所有的北伐军之性质程度及训练，是不是同等的，是否含有投机权位分子，即训练最好的党军现在是怎样，你们倘不要求我详细指陈，我姑且不必多说。你们又当知：民众只认识事实，当看北伐军的实施政策为向背，任何人空口说好话都是无用的；并且我们固然应该引导民众赞助北伐军，然而一概蒙蔽民众欺骗民众，每个革命党人都不应如此。

你们说：“至于因北伐而筹款，为此间不得已之办法，足下固认此次出为防御之战者，则寇盗在门，岂容偃息，塞井夷绳，尚非苛政。政府以不忍之人心，筹不得已之款。兢兢业业，未尝稍弛，足下如能来此一游，必知真相。乃据远道传闻，遽施攻击，且施攻击于北伐中与贼相持之时，实此间同志所惶惑不解者。”既然出兵，自必要筹款；然不筹之于殷富，不筹之于官吏中饱，而摊派公债预征钱粮及于

一 决策北伐的是是非非

小商贫农，且有恢复赌捐之议，好一个不得已之办法，这都是远道传闻吗？并且你们自己公然说：“因增筹战费而及于平民是事实上的要求”，又说：“广东农民困苦、负担太重，这是革命过程中不能避免的事实。”既然是事实，又何以说是远道传闻呢？总之，你们的责任是在力求与贼不同，并不是于北伐中与贼相持之时力拒任何忠告！

你们说：“尊著中对于国民政府的政治实力及国民革命军革命，一概加以否认，且因此否认此次出师之为革命，尤近于臆断。”在一般意义上，不但现在的国民政府和现在的出师北伐是革命的，就是以前杨刘讨伐沈鸿英讨伐商团，在客观上都是革命的；有许多人以为此次北伐的内容虽然有些缺点，而北伐军所占的地方，总比吴佩孚好些，这个事实，除了帝国主义及军阀，无人能够否认。然而我们以为这样观察批评国民政府及其北伐军，与其说是恭维，不如说是轻蔑；因为凡是尊重国民政府的人，应该要求他有高度的革命性。事实是怎样呢？中山先生拥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此革命政策，都几乎推翻了，现时还在推翻的运动中，北伐总司令部成立后，国民政府几乎是无形取消了，北伐期中限制人民自由的什么条例几乎颁布出来了，什么“因增筹战费而及于平民是事实上的要求”，什么“农民困苦负担太重这是革命过程中不能避免的事实”，竟成了政府党人口中革命的理论，这样来革命，其结果怎样呢？

.....

你们不相信“近来国民政府对农民态度已经使农民怀疑”之说，广东之五华、中山、花县，广西之东兰、平南、怀集等处农民，被驻军县官蹂躏的事，你们不知道吗？中央党部中，国民政府中，都有人大喊农民协会是土匪，你们不听见吗？这样怎令农民不怀疑！

你们要问北伐时期成熟的标准吗？在内须有坚固的民众基础，在外须有和敌人对抗的实力，民众的暴动已经非有充分的准备不可，何况国民政府的北伐是有一定领土的政府的正式北伐。

你们以为我说讨伐军阀还不是直接和帝国主义武装冲突，这是我没有把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关系弄清楚；我们知识浅陋，一向不曾把军阀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弄清楚，只知道国民党右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还